

往事堪回首 教诲銘心间

——回忆陈毅军长二、三事

市委顾问 钟剑平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诞生六十周年之际，我以无比敬仰的心情，深切缅怀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我的老首长陈毅同志。他英勇战斗的光辉一生，无私无畏的革命精神，光明磊落、心胸坦白的高尚情操，已成为矗立在人民心中的丰碑，将永远激励着我们前进。

一九四〇年秋，国民党反动派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竟然下令我八路军、新四军一律限期撤到黄河以北。这时，陈毅同志是新四军江南指挥部的指挥，奉党中央毛主席的命令，率部过江，挺进苏北开展敌后抗日战争。国民党顽固派韩德勤不让我军有立足之地，妄图致我军于死地。在忍无可忍、退无可退的情况下，在同年十月同顽军决战于黄桥。这次战役，由于陈毅同志贯彻执行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争取中间派，孤立顽固派，并善于合纵连横，运用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一举歼灭了顽敌八十九军、独六旅以及小部分前来配合的保安旅，共一万一千余人。解放了东台、盐城、阜宁等七个县。黄桥战役的胜利，开辟和建立了苏北大片抗日

根据地，增强了全国军民抗日的信心。

这时，我们江北指挥部，在津浦路东地区，也多次粉碎了敌人的“扫荡”，扩大了根据地。我们一部分同志跟随刘少奇同志到苏北盐城和陈毅同志会师。当时我是新四军江北指挥部人事教育部参谋。我初次见到陈毅同志，是在黄桥大捷不久，我们从黄桥到新四军军部驻地——盐城的路上。

我们乘坐一艘刚从敌人手里缴获来的小火轮，火轮上坐着几十人，显得有点拥挤，可是大家都不顾及这些。小火轮徐徐前进，我们望着苏北大地的风光，心情都很愉快。

这时不知谁喊一声：“陈指挥！”大家的目光“唰”地都集中到一个人身上。只见陈指挥和我们穿着一样的灰色军装，腰束皮带，胳膊上带着新四军的臂章，他神态从容，英姿潇洒。啊，陈指挥，人们对你在江南作战有多少传说呀，今天竟然在这样一个普通的小火轮上见到你，谁不高兴呢！每个人都想走上前去和陈指挥说一句话，握一握手，可是，大家又控制住自己的感情：不能这样，不能过多地打扰陈指挥。近些天黄桥战役，陈指挥昼夜在前沿指挥所，看，他眼睛虽然闪射着光芒，但他的脸上却透露出疲劳的神情。我们只能是这样远远地，默默地望着他。

这就是我第一次看到陈毅同志。

一九四一年皖南事变以后，在苏北盐城重建新四军军部。党中央毛主席任命陈毅同志为新四军代军长，刘少奇同志为政治委员，下辖七个师，继续坚持团结抗战，反对投降，反对分裂。

日寇、汪精卫、蒋介石加紧勾结，对抗日军民两面夹击，反复“扫荡”，形势越来越紧张。

同年七、八月份，盐城反“扫荡”开始了，新四军军部从盐城转移到阜宁湖垛镇一带农村。当时日伪“扫荡”十分残酷，我们白天不易活动，大部分夜晚行军，军直机关也分小片活动，化整为零，分布在附近各个农村。

一天傍晚，陈毅军长将我叫去。当时我是军部管理科长，肩上还背着用干粮袋装的一串银洋（在战争中的新区都用银洋作为货币）。我见陈军长时，心情有些紧张，不由自主地用手轻轻地往后推推这串钱袋。陈毅军长好象发现了这些，语气温和，但又急促地说：“现在部队急需给养，你马上到供给部去领。”我立即答应：“是”。行一军礼，迈步刚要出门，陈毅军长又把我叫住，亲切地说：“你带这么多银洋，路上不方便，又危险（当时土匪很多），放到这，我替你保管。”听到陈毅军长的话，我心里顿时热乎乎的，刚才一时紧张的情绪，早就飞到九霄云外去了。我一边解下肩上的银洋袋，心里一边琢磨着说几句感激陈毅军长的话，可是到后来，不知为什么一句话也没有说出来，只是捧着那沉甸甸的钱袋，轻轻地放在陈毅军长的手上。

这是我第一次直接接触陈毅军长。虽说战事这么紧张，时间这样短促，却给我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象。他那爽朗、坦率的性格，不以领导自居，待人真诚、平等，并能身先士卒，体贴入微地关怀干部、战士的高尚革命品质，使我至今铭刻在心。

那天晚上，我带着一个通信员，备上两匹马，六点多钟从军部驻地出发，去供给部。

两匹战马，在苏北夜间的小路上奔跑，时而一前一后，时而并驾齐驱。一路上我们并无言语，都精神紧张地搜索着

前方一切可疑目标，耳边听着八面声响。此时，苏北正是水稻扬花季节，缓缓清风，送来阵阵稻花香，天上月明星稀，稻田里月影斑驳。祖国的月夜多么美好！我们正是为了这大好河山不受外寇铁蹄蹂躏，我们的人民不受凌辱，将来能够过着美好的生活，今夜才飞马驰骋在苏北的小路上，我觉得浑身充满了力量。

大约十点钟，我们到达了目的地，两匹马跑得汗淋淋的，我们把马儿放在村外草地上吃草，便进村办事。

当我们把给养（领取公粮的票证和银洋）领回到村边牵马时，忽然发现两匹马不见了，心里十分着急，悔之当初不该将马放在村外，可是现在怎么办呢？我望着前面黑沉沉的路，只有跑步了。等我们奔跑一夜，回到军部时天已大亮了。把给养交给科里会计，我去找陈毅军长汇报，这时陈毅军长已下部队不在军部了。

半个多月后，军部又转移到另一个农村时，陈毅军长才看到我，他亲手将银洋袋子交给我，并说：“我花掉一元钱。”这时我才发现袋子里多了一张条子，看那签名，果然是军长亲笔。

原来在反“扫荡”时，来不及回部队吃饭，陈毅军长有时就在老百姓家吃饭，花去了一块钱，就写此条以作报销凭据。

陈毅同志身为一军之长，这样一件小事，都能严于律己，一丝不苟，这对我们当时作经济工作的是一次多么深刻的教育啊！

军部由盐城转移农村时，华中局书记刘少奇同志也在军部。一天上午，敌人从东汤河的方向，沿水、旱两路向盐城奔

袭，敌人以为我们军部还在盐城，实际军部已撤出盐城，但离东汤河只有两三里路。我们可以听见鬼子的气艇在东汤河上行进的声音。情况异常紧张，当时军部只有一个警卫连，陈毅同志为了保护代表党中央、代表华中局的刘少奇同志，亲自带一个警卫排，去观察地形，侦察敌情，准备抗击敌人。我见陈毅军长胸前挂着望远镜，大步流星地走在前面。虽说是非常危险时刻，大敌当前，他却从容不迫地部署着警戒。村外不时地传来阵阵枪声，陈毅军长密切地注视着敌人的动态，他一直坚持到敌人过去了，一切又恢复了平静。陈毅军长风趣地说：“我们就在他眼毛低下，他却无法看见。”随即爆起一阵笑声。我们大家都觉得，和陈毅军长在一起，总是那么乐观愉快，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一切敌人都可以战胜。大家特别喜爱听他欢畅的谈吐和爽朗的笑声，这一切好象给人们增添了无穷的力量。

后来我们知道村外的那阵枪声，是“鲁艺”的同志遭到日寇的袭击，著名作家邱东平同志，就是在这次反“扫荡”中牺牲的。

因为我在新四军军部任管理科长，和陈毅同志的接触较多，他那艰苦朴素的作风，时刻在感染着我们。那时候，毛主席给部队规定官兵一致，上下一致的原则，从军长到伙夫都一样，陈毅军长时时按照原则办事，从不搞半点特殊。

我们知道，陈毅军长已四十岁了，才和张茜同志结婚。当时张茜同志在新四军文工团工作，结婚时，谁也不知道。他依然穿着那件灰色军装，没制一件新衣服，没用公家一文钱。当然也没有请客，更不会有人送礼，就这样丝毫没有声张，简简单单普普通通地结婚了。

当时我想，这样一位为革命出生入死几十年，为人民立下不朽功勋的高级首长，处理自己终身大事竟是这样简单，堪为我军表率。以后一些高级领导结婚，都自觉以陈毅军长为榜样，这件事一直影响深远，给人们留下了美好的记忆。

后来，由于工作的调动，很长时间没有和陈毅军长接触。直到一九四六年以后，蒋介石撕下一切假面具，全面进攻解放区，三年解放战争开始的时候，在莱芜大战的前夕，又有幸听到陈毅司令员的讲话。当时陈毅军长是华东野战军的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我是华东野战军前方卫生部政治处主任。这是一次团以上的干部会，一晃几年没有看到陈毅军长，这次看到他觉得特别亲切。陈毅同志很是健谈，他性情刚直，思想敏锐，谈吐豪爽，对我们有很大的鼓舞。

开会的同志，大家都认真地作笔录，忽然陈毅同志提高了嗓音，并打着手势，他的手势不仅有力，而且富有很强的节奏感。陈毅同志说：“敌人大军压境，仗是非打不可，现在规定三条：这仗打胜了回来开庆功会，打败了回来开斗争会，牺牲了回来开追悼会，只有这样，别无他法！”

陈毅同志的话，震撼着我的心，使我长久不能平静。大家信心更足，情绪高涨，个个摩拳擦掌，恨不得一下子冲到战场上去。

不久，即一九四七年二月，莱芜大战开始了。这一战役在毛主席和中央军委的正确领导下，在陈毅同志和其他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直接指挥下，全歼敌人六万余人，创一次歼敌七个旅的光辉战绩。

陈毅同志在历次革命斗争中，建立了伟大的不朽战功。他忠实执行毛主席的军事思想和战略战术，立场坚定，旗帜

鲜明，襟怀坦白，公正严明，赤胆忠心，无私无畏，从不隐晦自己的观点，他的一言一行，都站在党和人民的一边。每当想起这些，我就觉得陈毅同志音容宛在，教诲永存。陈毅同志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总理送我踏征途

离休老干部 阎明诗

这已是四十年前的往事了。但在我的记忆里，它依然是那样鲜明，那样生动。是敬爱的周总理指引我走上了革命的征途，是敬爱的周总理给了我战胜困难的力量。因此，每当我回忆起这段往事，对周总理的崇敬之情便油然而生，周总理对我的多次教导又一齐涌上心头。

去 延 安

一九三八年，我正在成都华西坝金陵女子大学读书。当时，我们一些爱国青年，经历了日寇进占南京，国民党政府撤到武汉，而且又准备逃到峨嵋山的屈辱；同时，也受到了共产党领导和组织广大抗日爱国群众坚持持久抗战、反对妥协投降斗争的鼓舞。我下定决心，放弃学业，奔赴抗日前线，为国家为民族做一些有益的工作。我得到了父亲阎宝航的支持后，于一九三八年三月离开成都到重庆，又乘川江轮船顺流而下到了武汉，按照父亲的指点找到了十八集团军驻武汉办事处的地址。在那里，我第一次见到了深深崇敬的周恩来同志。

我父亲阎宝航当时是新生活运动总会的总干事，兼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的少将参议。他早在一九二三年就接触马列主义，和共产党人有着深厚的友谊，后来一直在周恩来同志直接领导下掩护党的地下工作。在平时谈话中，父亲对周

恩来同志的远见卓识和革命胆略表示了由衷的仰慕之情，给我留下了极深的印象。

当我来到办事处，工作人员立即领我来到周恩来同志的办公室。他向周恩来同志小声说了句什么，周恩来同志便放下手中的工作，从写字台后的坐椅里站起身来和我握手。他听我说明我的要求后，微微一笑说：“你很象你父亲，我一看见就知道你是谁的女儿了。”

这句亲切的话，缓和了我的紧张心情。他接着问：“你父亲同意你去延安吗？”我急切地点了点头。他稍稍向前探了一下身，又问：“你吃得了苦吗？”“能，我能吃得了苦。”我尽量把这几个字说得很响，表示我不怕苦的决心。周恩来同志听了我的回答感到满意了。他要我做好准备，包括思想上的准备，等候通知。我不敢耽误周恩来同志的宝贵时间，当即向他告辞，退了出来。

我回到上小路一号平津流亡学生宣传队的住所，坐在地铺上，还一直在想着周恩来同志的话。“你吃得了苦吗？”“你要做好准备。”是呀，由于我父亲的社会地位，我一直过着教会大学生的优越生活。现在就要踏上革命征途了，还需要做些什么准备呢？我低头看了看脚上的鞋，那是一双进口的捷克皮鞋。这种鞋是不能穿了，它和革命者不相称。我又摸了摸自己的头发，那是梳的披肩长发。大概是周恩来同志看我的打扮有些娇气吧！我立即跑到附近的一个理发店，理了一个露耳朵的短发，大家看了都说我象个假小子。

几天后，我们这一批青年从武汉乘火车到达西安，找到了十八集团军驻西安办事处。那里的同志已经按照周恩来同志事先发来的电报，安排了我们去延安的车辆。在家里，常

常听父辈们讲共产党人的处事为人，知道共产党人都是大公无私的人，为解救劳苦大众不惜抛头颅洒热血。我以为，自己踏上了革命的路，也就是革命的人了，不能有一点自私自利思想。因此，一路上把我随身带的钱和衣物都分给了大家。

汽车来到延安，老远看到了宝塔山，看到了延安古城，我的心激动得跳到了嗓子眼，和大家一起站了起来。一个男同志跳着喊着，当汽车拐弯的时候，扑倒在车上。是呀，到了日夜憧憬的革命圣地延安，那种兴奋心情怎么能控制得住呢！

在我到了延安后不久，我的二妹、大弟、二弟也都先后到延安学习。

入 党

一到延安，我就被分配到抗日军政大学学习，毕业后分配到延安女大工作。

延安的生活的确艰苦。由于国民党的封锁，吃粮很困难，蔬菜得定量，但却没听到一个人叫苦。吃饭的时候，指导员动员身体好的同志让身体弱的多吃点，我就尽量少吃。挖窑洞时大家都往前抢，我更不肯示弱。晚上，我不管怎么累，也要帮助文化水平差些的同学复习功课。

一天夜里，我和住在一个窑洞的小黄谈心。她问我：“你想不想参加党？”我不解地说：“来延安的路上我就共产啦，我还不是党的人吗？”小黄笑着推了我一把，说：“那不算入党。参加党得写申请，还得宣誓为共产主义奋斗一辈子。”我急切地说：“那咱们赶快写申请吧。你写不

好，我帮你写。”一九三八年七月十四日，我被批准入党了。在入党宣誓那天我才知道，小黄早已是共产党员了。

一九三八年八月，周恩来同志回到延安参加党中央召开的会议。九月的一天，他给我们做了关于形势与前途的报告，号召我们学好政治和军事，早日到抗日根据地去，到敌人后方去，到国统区去，开展抗日救亡工作。周恩来同志还讲述了国统区人民对八路军、新四军和陕甘宁边区所寄予的殷切希望。他的报告给了我极大鼓舞。我决心早日到抗日第一线去，为党做更多的工作。

关 怀

一九四一年珍珠港事件后，日本侵略者妄图早日结束侵华战争，国民党也加紧反共。在这种紧张情况下，一九四一年底组织上决定以养病的理由调我回重庆协助我父亲的地下工作。

几天后，我们一行四十多人，由十八集团军驻重庆办事处联络参谋龙飞虎同志带队，分乘两辆卡车由延安出发。车到凤翔和宝鸡之间的一个国民党检查站，他们借口我们不都是伤病员不许通过。经一再交涉，最后决定一辆卡车返回延安。我们这一辆经过许多周折，于一九四二年二月七日下午抵达重庆曾家崖五十号周公馆。

当天晚上，周恩来同志来到我们的休息处，热情地握着我的手，问我的病情。我向他汇报说，在延安学生疗养院住了三个月，已经基本好转。他说：“那很好。你爸爸妈妈很惦记你，回家后先好好养病。现在我送你回家。”说完，他从一位同志那里借了一件蓝色呢大衣披在我的身上，又摘下我

头上的军帽让我拿在手里，然后站开一点，审视了一下，满意地点了一下头。我们走出门外，天色已经漆黑。他先让我上了汽车，然后他也跟着上了车，坐在靠车窗处。汽车驶向市区，周恩来同志的目光一直注视着车上的反光镜，沉默不语。我定睛看了看周恩来同志，比在延安看到他时又消瘦了，但他还是那么精神矍铄，目光炯炯有神。我不敢打断他的沉思，只是在心中默念：敬爱的周恩来同志，是您亲自介绍我去延安，使我从一个幼稚的革命青年成长为一个共产党员，现在您又亲自送我回家……我想着，泪水早已模糊了我的视线。

汽车在重庆村前停下了，周恩来同志健步走下汽车，我随着他，进了门坊，沿着缓缓的上坡走了一段路，经过几排楼房，又走下几级石阶，到了最后一排楼房的最后一家，十七号的门口，周恩来同志上前正要叩门，门却开了，我母亲迎了出来。上了二楼，周恩来同志亲切地对我母亲说：“大嫂，我把你女儿送回来了。”母亲忙说：“周副主席，您这么忙，外面又不安全，还要亲自送来……”母亲说着，声音也哽咽了。这时，周恩来同志一手拉着我九岁小弟的手，一手抚摸我十三岁小妹的头顶，低下身来问：“你们什么时候去延安？”母亲替他们回答：“大一点就去。”

我们刚刚送走了周恩来同志，父亲满头大汗地赶了回来。听说周恩来同志已经走了，他感到十分不安。他是在为周恩来同志的安全担心呢！

重 庆 村 十 七 号

重庆村十七号是一幢三层楼房。从十七号的后门出去，

是后围墙上的小角门，出了小角门沿一条行人稀少的小路往前走，就走上大街了。从这里出入，在白天也是比较安全的。我去延安后，我父亲利用他国民党上层社会的合法身份，在周恩来同志直接领导下，在这里为地下党做了许多掩护工作。我这次回到重庆，除了为地下党做电台通讯联络工作外，在家里就是协助父亲做掩护工作。

周恩来同志也常到十七号来开会，或是布置工作。他每次来，都是先由联络员王梓木同志来作安排。王梓木同志装有一只假腿，手上拄一根木杖。他一来，楼梯上就发出假腿和木杖扣击楼梯板的笃笃声，我们就跑下楼去迎接。记得一九四二年的一个夏夜，周恩来同志在重庆村十七号召集文化界人士开会，我守卫在前楼。也许是我警戒过于专注了吧，周恩来同志走到我的身边我才发现。他微笑着握住我的手，轻声地问我，回到重庆这几个月都做了些什么。我回答说，为了完成党交给的任务，正在继续学习英语和俄语。周恩来同志告诉我，工作要细心，不能有半点疏忽。外出时，在穿着打扮上也要注意，发现有特务盯梢也不要紧张，想办法甩掉他。他还嘱咐我：“要好好学习英语，我们的工作需要更多的人会英语。”听了周恩来同志的这些教导，更增强了我完成任务的信心。

不久后的一天，我外出执行任务。回家时为了摆脱特务的盯梢，汽车开到离我家很远的地方停下了。当时正下着大雨，下车后我赶紧往家跑。可是跑了几步，感到脚上穿的高跟鞋很碍事，索性脱下来夹在腋下，一气跑到家。我进屋后，被父亲一眼发现了，当即严肃地批评我：“看你这个样子，那里象个‘小姐’？”我低头打量一下自己，确实不象

样子：浑身湿得响透，衣服被雨水粘在身上，脚下流出了一滩水，两只泥脚就站在这滩水中间。这样子要是叫特务看见……我悔恨没有牢记周恩来同志的教导，感到深深地内疚。从那以后，我严格要求自己，从言谈举止到穿着打扮，都尽力做得符合“小姐”的身份。虽说装得还不是十分太象，但也没出过什么纰漏。

一九四五年八月，日本投降了，举国欢庆。可是卖国贼蒋介石却坚持内战独裁，制造了一连串的反共反人民的事件。在那腥风血雨的日子里，为了展开争取和平民主的斗争，周恩来同志几次来重庆村十七号布置工作，我们家也就常常响起假腿和木杖扣击楼梯板的笃笃声。周恩来同志每次都是匆匆而来，脸上带着严肃而沉着的神情。他除了开会、布置工作外，见到我们很少说话。但他每次临走时总要对我们深情地点点头，我们也都向他点头表示崇敬的心情。

记得在一九四五年冬，周恩来同志携一名随员来十七号布置任务，我守卫在客厅。大约一个多小时后，听到周恩来同志下楼的脚步声，我就等候在客厅门口。见他向客厅谛视了一下，敏捷地走下最后几级楼梯，便转身折回厨房，出后门沿围墙外的小路走去。在那斗争十分紧张、复杂的日子，周恩来同志为国为民呕心沥血的崇高品德，在刀光剑影中镇定自若的革命气质，给我们完成党交给的任务增添了无限的力量。

从那以后到全国解放，我没有机会再见到周恩来同志的容颜，再聆听他老人家的教诲。但他那如参天劲松似的高大形象，春风化雨般的话语，却深深地镌刻在我的心上，指引着我坚定不移地为党的事业去努力工作。

爱党如爹娘

——忆朱总司令

老红军、市政协副主席 尤奋涛

西安事变之后，党组织调我到延安抗大学习。一天上午，军事课临结束时，队长通知说：两点到操场集合，朱总司令要给我们讲话。我听后异常兴奋。啊！我终于要亲眼见到久已敬仰的总司令了。

午休之后，当主持大会的同志宣布开会，总司令笑呵呵地走到了台前。我一眼望去，见他穿着一身灰色战士服，腰间扎着一条和战士一样的普通窄皮带。我真没想到，这位名震中外的大将军，原来是这样平凡、朴素。在后来多次接触中，不断地丰富充实了我的这一印象。

一九三七年八月上旬的一天上午，队长刘忠通知调我到部队工作，并要马上去校部集合。我急忙赶到校部，校部门前停着两辆卡车，学员陆续来齐，连我共十人。一会儿朱总司令带着几名警卫员也来了，相随的还有数名干部。大家分乘两辆卡车，就出发了。当时阴雨连绵，道路泥泞。卡车走一段就陷住了，需要垫道、拽车。每次朱老总都和大家一起干。可是车不争气，没等大家散汗，又陷在泥坑里。反复几

次，大家有些泄气了，坐在路旁，低头不语。这时，朱老总稳稳地站在车旁，既没有责备，也没有命令，而是以坚定的带有动员的口吻说：“咱们还得垫呀！”他边说边弯下腰去。在老总的带动下，大家很快将路垫了起来，汽车又前进了。我们几名抗大学员，经过月余紧张的行军，赶到了部队。我被分配到一一五师六八九团政治处工作，该团是由红军七十八师改编的，立过很大的功绩。朱老总对这支部队十分关心、爱护，一有机会他就去该团了解情况，指示工作。

一九三八年二月的一天，连以上干部在旅驻地开会。不一会，旅长徐海东、政委黄克诚陪同朱总司令来到会场。没有想到，时隔不久，又看到朱老总了。黄政委说：“今天请总司令给同志们讲话。”在一阵热烈的掌声中，总司令向前踱了几步，他笑容满面，显得格外的愉快、高兴。他那次内容深刻、语言朴素、富有风趣、富有教育意义的讲话，我至今记忆犹新。他告诉我们：连长、指导员怎么样才能带好兵呢？很重要的一条就是要求战士怎样做，自己就要带头首先做到。要把连队管好，最重要的就是首先把党的支部工作做好，支部是连队的战斗堡垒，支部搞好了，就好办了，你那个连队保证能打胜仗。

八路军在朱总司令直接领导、指挥下，挺进到华北太行山地区，迅速地创建了抗日根据地，广泛开展了游击战争，消耗了敌人，钳制了敌人。不久，日本侵略者对晋东南抗日根据地疯狂地举行九路围攻，我军奋起抗击。我团在刘伯承师长指挥下，配合一二九师两团兵力，截击敌军一路主力，追击四昼夜，到第五日黎明，在武乡长乐村与敌相遇。我团与友邻部队一起，同敌人展开激战，给敌以很大杀伤，打得敌人

胆战心惊，至黄昏时刻，敌不支溃逃。至此，敌人的九路围攻，以彻底失败而告终。

战后的一天黄昏时分，全团干部、战士集合到一个村庄。不一会，团长韩先楚、政委康志强陪同朱老总、徐向前同志来到队伍前面的高地上。韩先楚同志宣布：欢迎总司令给我们讲话！会场上立即响起一阵热烈掌声。总司令面色略显严肃地说：“在敌人的优势火力下，敢于向敌人冲锋、搏斗，那种不怕牺牲的精神，只有我们共产党领导下的工农红军才能做到。”最后，他给我团布置了新的任务：到河北平原地区去创建根据地、扩军，将部队充实起来。我团接受了总司令给的任务。时在春季下太行，挺进到冀南地区，胜利地完成了战斗、扩军、创建抗日民主根据地等任务，奉命返回太行山晋东南地区，驻军于长子县城东北的一个村子。一天黄昏，总司令又亲临我团，听取营以上干部的汇报，从晚七时开始，一直听到天亮，他那不知疲倦的工作精神是何等的感人啊！不几天，他又来我团，指示我团抓紧整训，提高部队的军事、政治文化水平。在总司令的关怀下，部队整训搞的真是朝气蓬勃，热火朝天。

一九三九年夏季，我旅在晋东南高平一带驻地，召开旅党代表大会，朱老总也赶来参加大会。会议开了足有半月，总司令从头到尾都参加，没有一次迟到或早退，白天参加大会，晚间召集团级干部开小会，解决干部之间的关系和个别同志的错误问题。他带着一部《列宁选集》，有空就看，孜孜不倦地学习。会议进行到一定时刻，他就讲起话来。总司令在多次的讲话中，深入浅出地分析了国际国内形势。他在讲话中谆谆地告诫我们，为了完成党交给的任务，